

关于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整理与诠释

黄怀信

摘要: 儒家经典文献研究, 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个方面。欲使经典文献更好的为现代服务, 必须首先整理出尽可能完善并且具有时代特色的文本。对旧本中可以确定的错字应当加以改正, 文本中的古字应当改成今字, 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通假字也应当改成本字。诠释方面, 应当针对文献运用中常见的诸如随意发挥、断章取义、人各一辞等实际现象, 本着科学精神, 最大限度地揭示经典文献的本义, 从根本上杜绝诸种顽弊的出现, 并且逐渐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校勘; 诠释; 古今字; 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6-0003-04

儒家经典文献, 主要指“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 也是中国早期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研究这些文献, 是一切相关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或者说, 一切相关的研究, 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些文献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否则, 其研究便是空中楼阁, 经不住时间考验。研究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不可能人人都先去研究原典。但是, 每一个研究者无疑需要利用经前人整理和研究过的原典。固然有的研究者文献水平很高, 但也不可能一切从头做起, 因为文献的整理研究需要做大量的专业工作, 所以他们实际上也需要利用专业工作者的成果。而对于普通需要学习和了解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 他们更需要经过前人整理注释乃至语译过的原典。从这个意义上说, 儒家经典文献需要现代整理本。

毋庸讳言, 各种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整理本已经不少, 有的, 比如《论语》等, 已经多到几乎泛滥的程度。但是, 依然不能真正适应现代研究与学习的需要, 当然我们不是说数量。因为时代发展, 要求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必须讲求科学性。而作为基础研究的文献研究, 自然而且也必须更加讲求科学性。所谓科学性, 就是研究结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符合其本来面目。对于经典文献来说, 就是要真正揭示其本来涵义, 使之完全符合“古圣贤之心志”。要做到这一点, 自然首先要有能够体现古圣贤心志的文本, 而这

种文本的产生, 则需要通过校勘。所以, 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整理的首要任务, 就是对文献文本进行校勘。

古人刻书、注书注重校勘, 所以读书也讲究版本。今人整理古书忽略校勘, 所以读书多不求版本。即使是知道求版本之人, 在他们看来, 读书只要找一种好版本、整理古书只要用好版本做底本就行了。实际上, 儒家经典文献的任何一种传世版本, 包括所谓“善本”, 其文字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错误, 有的甚至十分严重, 所谓“善”, 也只是相对的。就是说, “善本”未必字字皆真, 而不善之本未必没有超越善本之处。时代要求我们, 对于经典文献的校勘, 不能永远停留在相对地善, 而是必须尽可能地追求完善, 因为否则就不能完全体现古圣贤之心志, 就不科学。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做到百分之百地善, 但尽可能地争取将错误降到最低, 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 则是可以做到, 至少是应该做到, 关键是必须去做。怎样将经典文献的文字错误降到最低, 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 这是专业问题, 这里只谈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校勘要不要改字。现在通行的校勘方法是不改字, 而以校勘记的形式将所校出的异文标出, 否则会被认为不规范。因为自清代以来, 学者们普遍认为, 古籍文献不能随便改字。应该说, 这种严谨的态度, 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 清人的这种观点, 首先是针对明代人妄改古书而提出的, 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妄”改, 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校改。事实上清代著名的校勘大家, 他们校勘古书都作校改。比如戴震所校的《大戴礼记》、卢文弨所校的《逸周书》等, 都有不少校改, 而正是因为有校改, 所以才被视为善本。事

收稿日期: 2006-1-4

作者简介: 黄怀信(1951-),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典籍研究与整理。

实上，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古籍善本，也都是校勘本，而不是翻刻本或覆刻本。这就足以说明，校改古书并非不合“规范”。众所周知，当年刘向父子校理群籍，就是通过比勘众本而后写定的。后人校书，也率有改订。以《论语》为例，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多引郑玄曰“鲁读某为某，今从古”，说明郑玄当年校《论语》，就多以《古论》改《鲁论》。再比如后世所传的几种重要的《论语》版本，如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唐开成石经本、宋邢昺《论语注疏》本，各有不少异文，这本身就说明，各家当时均有校改。也正是因为各家均有所校，自成为一种新本，所以后人才能各有所从。而相反，同样是《论语》，清代以来有不少散见的校勘成果，包括阮元的《论语校勘记》、翟灏的《四书考异》、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等，虽然均有不少发现与创获，但均未写成定本，所以不为人重视或知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校书如不改字，几同不校。如果坚持不改字的习惯或“规范”，后人只会无休止地进行重复劳动，而古籍研究，也只能永远地原地踏步，无法产生新的突破。这种现象，显然与科学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旧的观念，对古书中的错误，该改者一定改，使之尽可能地接近古人原本。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随意乱改，而是主张有切实依据的改。只要有依据、有道理，就必须改。前人之所以不愿轻易改字，实际上说穿了还是因为不自信。如果我们有切实的依据，有充分的道理，为什么不自信？当然，改，就有改错的可能，但我们可以尽量避免，而且即使偶尔改错了也不要紧，因为改错了总容易发现，下次再改回来就行。事实上前人校勘确实有改错的，而正因为前人有错，所以更加需要改。比如今本《论语·述而》篇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经典释文》、唐石经、皇侃本、日本正平本、定州汉墓竹简本，均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只是邢昺本、朱熹本以下才同今本。这就说明，这一句可能是宋人所改。宋人之所以改这句，无非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旧本“我”字重复，不如删去前“我”，再把“得”改为“有”读起来语顺。（可见他们也有改的道理。）宋人虽删去了前面的“我”，但解释仍遵前人有“我”之说。如邢昺疏曰：“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相悬。”完全与何晏《集解》一致。朱熹《集注》亦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但没了“我”字，在后人读来，“三人”就极易被误解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三人。不相干的三个人行路，怎么就能有我师？既是行路，后文为什么又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行路有何善与不善？为何要从之、改之？可见完全讲不通。实际上这一章的

本义是说：“（比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事，一定能从中得到我的老师。选择他们的好主意照着去做，不好的就改正它”。“行”指行事、做事；“善”、“不善”指做事的主张与方法说。正因为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人，所以才言从之、改之，可见前面的“我”字不能删。由此可见，这一章是宋人因为不理解文义而改错了。所以阮元校勘记也云：“当以皇本为是。”那么我们今天又根据旧本把它改回去，不正是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了吗？如果我们今天不加改动，前人的错误不是正好被永远保留下去了吗？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前人有改错的我们就不再改。

二、古今字问题。众所周知，传世儒家经典文献中有不少所谓的古字，如《论语》中的“弟（悌）”、“说（悦）”、“女（汝）”、“知（智）”、“道（导）”、“辟（避）”、“与（欵）”之类。这些字，传世本及现代整理本基本上都是原样保留。其实，这些字完全没有必要继续保留。比如《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说”，凡读过《论语》的人，无不知其要读为“悦”，而传世宋代以来的版本及今人注释本，却几乎无不承汉唐以来的旧本保留“说”而不用“悦”，然后再加上诸如“‘说’、‘悦’同”，或“‘说’读为‘悦’”，或“‘说’借为‘悦’”之类的注解。如此徒增曲折，有何必要？而如果不加注，不熟悉的人自然会照“说”字去读，照“说”字读，意思自然又不明白。那么如果直接将文本中的“说”改成“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见继续用“说”字，有害无益。所以，改，胜于不改。而且“说”与“悦”以及“弟”与“悌”、“女”与“汝”、“知”与“智”、“道”与“导”、“辟”与“避”之类所谓古今字，实际上本身就是由于古今用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段玉裁云：“古今无定时……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①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孔子那个时代或许还没有“悦”字，或许因为音相同，人们习惯将喜悦的“悦”写成“说”，所以《论语》原本作“说”不作“悦”。而后代出现了“悦”字，加上语音变异，人们已不再习惯将“悦”写成“说”，而直接写成“悦”了。既然它本来就属于随时异用的字，那么在古书中怎么就不能随时而用呢？事实上，古人校书早就知道随时而用字。比如皇侃《论语义疏》本，就作“悦”不作“说”，说明梁代人已知用字需要与时俱进。如果说今所传皇侃本不尽可靠的话，那么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则百分之百的唐本，而其中的“悦”字也不作“说”，说明唐代人已不用古字。再比如日本正平十九年（相当于中国元代

^①《说文解字注》“谊”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94页上。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所刻的《论语集解》本，也作“悦”不作“说”，可见当时的日本人也知道不用古字。梁代人、唐代人，以及600多年以前的日本人都知道用汉字需要与时俱进，难道我们今天还必须迂腐到以不改一字为“规范”吗？事实上，旧时的版本承用古字，说穿了完全是封建文人的私心所致。因为对他们来说，古书越难读，他们才越有地位，才越有饭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留古字，为的就是不让人读懂。比如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不让读者和学生自己明白。这样不正显得学问之高深不易吗？就好比他们偏把《论语》读成《伦（音）语》，实际上也是为了提高其学问的神秘性，以维持他们的文化垄断一样。而今天，显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承他们的传统呢？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经典文献中属于古今字的古字，一定要改成今字。甚至有的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通假字，也应该改成本字。比如《论语·为政》篇“学而不思则罔（惘），思而不学则殆”，其“殆”字实际上是借为“怠”，指懈怠，而今人则多如字解为危险。思而不学，有何危险？可见还是通假字误人，所以必须改为本字。再比如《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之“适”，本是“敌”（古音同）的借字；“莫”，本是“慕”的借字。今人不知，多如字解而又不能通，可见也是通假字误人。如果改为本字，就容易多了，为什么不改？应当明白，现代整理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让现代人服务，是为了让现代人更加容易地读懂它，那么为什么还要保留许多不便？

以上是说校勘整理方面的两个问题，下面再说诠释。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与文本整理同样重要。因为有了能够体现古圣贤心志的和便于今人阅读的文本，并不等于就完全理解了“古圣贤之心志”，要完全理解“古圣贤之心志”，还需要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诠释。儒家经典文献难读，世所共知。即使一向被认为最容易读的《论语》，现在看来也有大量尚未读懂的地方，遑论其他？

如何真正读懂儒家经典文献，是专业问题。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儒家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必须注意从根本上克服文献运用中常见的以下三种毛病：

第一种，随意发挥。儒家经典文献的文义需要发挥，也可以发挥。但是，发挥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其本来涵义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其本来涵义，而随意地、想当然地发挥，必然背离“古圣贤之心志”，失去其原始涵义，发挥愈多，就离题愈远。所以我们说，义理之学不是不可以讲，而是必须在其本义基础上讲。宋明理学家讲义理而成显学，固然可喜，但正

因为他们所讲的义理已非原始儒学之义理，所以才被称为“理学”。而我们如果研究的是原始儒学，是孔子的儒学，那么就必须先正确理解儒学经典文献的本来涵义，否则你所讲的就不是真儒学，你所认识的就不是真孔子。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之所以被扭曲，根源就在于对经典文献的随意发挥，当然也有误解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先探求经典文献的本义上下功夫，不要还没有理解本义就先去胡乱发挥。

第二种，滥用材料。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儒学史，自然要引用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文句作为立论的依据。以研究孔子思想为例，纵观前人各家论著，在每一命题之下，都列举有《论语》中的材料。但是仔细读来，很多论著所列举的部分材料的真实涵义，与其命题并不相干，可见还是对文献的理解出了问题。应当指出，《论语》所纪录的孔子语录，每一条都有一定的背景与语境，所以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断章取义。另外，同一条材料被用来证明不同的命题，实际上也属于滥用。比如同一条孔子的语录，有的人用来证明孔子的这种思想，有的人用来证明孔子的那种思想。而我们知道，任何文献材料，它的本义只能有一种，孔子的语录，也不例外。当然，文献材料有时候可以赋予新的内涵，但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你研究的是孔子，那么你就不能给它赋予新内涵。总之，材料用不对，研究结论就不会科学。而种种滥用材料的现象的根源，都与对文献的理解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对文献做出科学合理的诠释。所以，儒学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必须日臻科学合理。

第三种，人各一辞。就是相同的材料，研究者各自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同样是孔子的思想，同样用的是《论语》中的材料，而前人各家论著之中的归纳就互不一致；同一个“仁”，各家对其所谓内涵或者结构的归纳，也各不相同，甚至出入很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真理，其实人们忽略了它的前提，这就是他所观察的客观对象本身，必须要有“仁”有“智”。否则，即使是“仁者”、“智者”，也不能见。而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不能同时有多种不同的面貌。所以，对孔子思想的归纳，从逻辑上说就不能有太大的出入。今各家互有很大出入，就说明还不科学。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人一次性的做到完全科学，但至少我们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不能永远地人自为说。因为文献的本来涵义，只能有一种。永远地人自为说，无异于做无休止的文字游戏，本身就不科学。克服这种现象的关键，还在于对经典文献做客观

合理的诠释。比如对孔子“仁”学的理解归纳，离不开《论语·颜渊》篇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表述，而对这一表述的合理诠释，则至关重要。前人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一般都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仁”的定义；“天下归仁焉”，就是天下归依仁，或者国家回到仁的意思。如此理解，则孔子这一表述与其“仁者爱人”的表述不一致。所以，“仁”被赋予了多项内涵。孔子这一表述的真正涵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对原文做贯通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论语》该章今本原文作：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①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又言“为仁由己”，有两个“为仁”，那么我们就不能只顾前面一个。如果我们将前面一句解释为克己复礼就是仁，后面“为仁由己”又将如何解释？另外，既然孔子答语两言“为仁”，那么颜渊所问也当是“为仁”，因为孔子不可能答非所问。这就是说，首句应作“颜渊问为仁”。孙奭《孟子注疏·万章上》引段曰：“（注云）‘《论语》颜渊问仁’者，盖《论语》第十二篇首‘颜渊问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云”。^②可见段氏所见本正作“颜渊问为仁”。所以，今本当脱“为”字。当然没有这个“为”字也可以讲，关键是必须搞清楚“仁”指什么，“为仁”是什么意思？首先，“为仁”在这里作为一个词组，“为”字显然是动词。那么“克己复礼为仁”，怎么能说是对“仁”的定义？所以即使没有“为”字，“颜渊问仁”也不能是问什么是仁，而只能是问怎样才能被人称为“仁”，或者怎样才能有“仁”的名声的意思。如果有“为”字，那就是问怎样造就“仁”的名声。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通过“克己复礼”造就“仁”的名声，或者说“克己复礼”才被人称为“仁”。更重要的是，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有“焉”字，则“归仁”更不能直接释为是归依仁或归于仁，因为“焉”是兼词（兼介词和代词）。“归仁焉”，就是把“仁”的名声归于他，“归”犹“归功”之“归”。而既言“归仁焉”，那么“天下”就只能指天下之人，而不能是指国家。可见忽略了一个“焉”字，材料就完全理解错了，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结论怎么能

够科学？事实上，将“天下归仁焉”解释成天下归依仁或国家归于仁，本身也不能通。因为“仁”是对人言的，天下、国家怎么能说“仁”？可见还是因为不了解“仁”的涵义。另外，“一日克己复礼”之“一日”，也不是有一天的意思，而是一旦的意思。“复”，借为“覆”，指覆盖于，是极言不出其范围。“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一点也不出礼的范围。那么，为什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人就会把“仁”归于他呢？因为礼，是社会规范。一个人一旦其视、听、言、动皆符合礼，就说明他时时处处想着社会，想着他人。这样的人，不就是一个真正的仁者吗？那么人们怎么能不说他“仁”，而把“仁”的名声归于他呢？可见这里的“仁”，其实质还是关爱他人，为他人着想。短短的一条看似不难的材料，几乎完全理解错了，结论怎么能够正确？前人围绕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还是礼的问题，打了不少笔墨关系，看来根本原因还是对文献没有吃透。同样，将“仁”归纳出不同的内涵，也是因为对文献没有真正理解。由此可见，文献的诠释对于研究思想是多么重要！所以，要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就不仅要是对文献做贯通的理解，而且对其中的每一个字词都要做合理解释。

以上三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都与文献的诠释不当有关，所以我们认为，儒学经典文献的现代诠释，必须讲求科学性，必须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揭示文献的本来涵义，纠正前人的误解，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诸种不能正确运用文献材料的现象出现，而且必须向逐渐统一的方向发展，不能永远地百花齐放。事实上我们只要有科学的观念，坚持客观的原则，不怀偏见成见，做到“诚意”、“正心”，儒学经典文献所蕴涵的真实的“古圣贤之心志”就必定能够被发现并得到认同。如果那样，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会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只有这样，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前言》中说：“如果能使这些中华传统典籍真正成为今天和今后好读、好用的书，那比写我自己的文章、专著，便更有价值和意义。”^③他之所以说诠释典籍比写文章、专著更有价值和意义，是因为他知道文章和专著需要建立在典籍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又说：“但此事极不容易。”（见同前）让我们为此事而共勉！

（英文信息转至第24页）

①李泽厚《论语今读·颜渊第十二》，三联书店2004年3月版，第316页。

②孙奭《孟子注疏·万章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733页。

③李泽厚《论语今读·前言》，三联书店2004年3月版，第20页。

可见刊刻者和增订者都是陈沂的南京同乡。本书卷前，有一篇顺阳李蓁所作序，李蓁自署“赐同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前翰林院检讨”。按李蓁字于田，内乡（今属河南）人，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提学副使，《四库全书总目》将其《黄谷琐谈》4卷、《李子田文集》4卷等书列为存目。其序文云：

德涵之武功，王敬夫之鄠县，何仲默之《雍大记》，崔子钟之彰德，童内方之沔汤，邵国贤之许州，外是而蔑有闻焉，是可易言已哉！故陈公鲁南著《金陵世纪》，不蔓援，不浮奖，质直简确，一披卷而数千年之迹俱在，是固所谓数家者类哉！陈公南□□，尝手绘《金陵图》，

镂板以传，而续为是书，又善如此，固知生其地，躬履目覩，与传闻异词者远也。而金氏在衡更加校雠，玉阳史君为寿之梓，事垂久远，可期也。二君诚有力哉！纪凡四卷，分类一十有八。陈公历官、文章，皆前有著，兹不具详也。

此序为行书，原缺第一叶前半叶。按康海字德涵，残序首句所缺应是“康”字，“陈公南”后三字亦磨灭不可辨认。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字句模糊泐缺，如卷3《纪山川》“八功德水”条“俄而□□□□”，就有四字不可辨识。这也是本书刊刻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表现之一。

On *Jinling Shiji*, A Rare Book on Nanjing

CHENG 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Jinling Shiji* by Chen Yi, which is recorded in *Siku Quanshu Zongmu*, is a rare book on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of Nanjing. Based on its only edition, the 1569 edition of this book,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amination of the scholarly background of its author Chen Yi, its composition and documentary value, and examines its editor and publisher as well.

Key words: Chen Yi; Nanj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Jinling Shiji*

(责任编辑：黄云鹤)

(上接第6页)

On the Modern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 Literature

HUANG Huai-xin

(Cultural Institute of Confuciu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 literature, it relates to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ny fields on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human social science. Desiring it to serve the modern better, first we must collate the perfect texts as possibly a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ra. For the wrong words can be defined in the old texts we should correct them, for the antiquated words of the text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the modern words, if the borrowed words not being corrected and the old errors cannot be righted, these words should be changed into the primitive words. On the annotation, we should be aimed at the familiar use of the literatures, such as these actual phenomena of taking for granted, quoting out of context and everyone explaining according to himself etc, in the spirit of science, reveal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lassic literatures by the greatest extent, stopping the stubborn abuse from arising and reach consensus gradually.

Key words: collation; annot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words; scientific

(责任编辑：刘兵)